

# 治理要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

张 光 , 陈 杰

(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

**摘要:**运用 2008 年 150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世界治理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解释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六个治理指标所反映的治理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按从大到小顺序排列是: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控制腐败、法治、政治稳定和言论与问责。大体而言,言论与问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及政府效能的一半。而且,当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时候,言论与问责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甚至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根据这些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制度建设,应以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控制腐败和法治建设,优先于言论与问责也即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建设。

**关键词:**治理;世界治理指标;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1)05-0074-08

## The Components of Governance and Their Different Impa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NG Guang , CHEN Jie

(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 Fujian 361005 ,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es a data of 150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reas to establish the regression model and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six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to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e six indicators have different positive impa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 ranking from the largest to the least: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 regulatory quality , control of corruption , rule of law ,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peech and accountability. By and large , the impact of the last indicator is less than half of that of the first indicator. Moreover , there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peech and accountability and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 we argue that in govern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 regulatory quality , control of corrup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should come before speech and accountability , namely , the democrat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Western sense.

**Key words:** governanc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1-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方政府行政成本与财政转移支付问题研究》(10BZZ035);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县财政科技投入决定因素及其成效研究:以福建省为中心》(2010R0083)

作者简介:张 光(1956-)男,江苏兴化人,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 杰(1986-)男,山东单县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话完全正确。尽管经济发展不是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必要条件。例如,经济发展的成果可以为少数人占有,对减小贫困没有助益,但没有经济发展则不可能减少贫困。<sup>[1]</sup>因此,追求经济发展成为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夙愿。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增长和发展了呢?鉴于世界经济统计是以国民账户的形式进行的,而这也确实是反映了自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相差甚大的事实,<sup>[2]</sup>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为什么有的国家享有较快的经济增长、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其他国家则经济增长很慢甚至停滞、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毛泽东从民族独立国家自强的观点,把中国能否跻身于前者行列提高到能否保住她的“球籍”的高度。

人类对这些问题的系统的理论思考,大致始自于亚当·斯密的时代。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学者们先是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水平,然后又将其归之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自1980年代起,在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学者和国际金融和发展组织(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署)开始从“治理”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sup>[3]</sup>如莫若所言,“腐败等恶治和弱制度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的消极影响,这一点已俨然成为共识”。<sup>[4]</sup>世界银行发表的《治理:世界银行的经验》一文指出:“善治集中体现为可预测的、公开的和理性的决策(即透明的过程);一个具有职业精神的官僚队伍;一个能对其行动负责的政府行政部门;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和所有的人和机构都在法治下行动。”<sup>[5]</sup>为了测量各国治理水平,世界银行开发了一套称之为世界治理指标的数据,这套数据由六个子指标构成:言论与问责、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sup>[6]</sup>使用这套指数,学者们试图就治理对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社会福利水平等的影响进行研究。本文也将加入这一系列的研究。本文的独特贡献在于:第一,与既有的许多研究试图利用这套世行研究各国不同的治理水平对其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同,本文考察的是世行治理指数所操作的各国治理水平对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或关联。第二,本文仔细地研究了各个治理指数所反映的不同的治理侧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什么我们的这两个研究重点能够成为“独特的”贡献?我们将在下面对此进行详细论证。

本文以下将这样安排。第一节介绍世界治理指标及其对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的解释性运用,并建立本文经验分析的理论框架。第二节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使用世行指数进行数据分析,以确定不同的治理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不同的影响,并以讨论这些发现的政策意义结束全文。

## —

世界治理指标只是国际上国家治理评估指标中的一种,但无疑属于影响最大的一类指标。俞可平主编的《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可谓是国际治理评估体系之大全。该书在报告俞可平主持的“中国治理评估框架”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还翻译介绍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治理指标项目(1项)、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机构治理评价指标体系(5项)、双边机构治理评价指标体系(3项)和独立研究机构治理评价指标体系(13项)。<sup>[6]</sup>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为考夫曼(Daniel Kaufmann)、科瑞(Aart Kraay)和马刺特鲁兹(Massimo Mastruzzi),因此这套指数又被称作KKM指数。世界治理指标是由世界范围内32多个组织创建的35个独立数据库中提取的数百个反映治理的变量综合概括做出的。主要来源为:住户和公司调查、商业信息提供者提供的数据、非政府组织和公共部门提供的数据。世界治理指标的设计和制作者Kaufmann等依据这些信息,形成了三组共六个指标的评估体系,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各国或地区的治理水平。

第一组的两个指标即言论与问责、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旨在刻画政府产生和替代的过程的质量。前者测量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参与选择他们的政府、表达意见的自由,结社自由,以及传媒的自由。后者测量一个国家的执政政府受违宪的或暴力手段影响而不稳定甚至被颠覆的可能性。第二组的两个指标政府效能和监管是对一系列有关政府制定并实施政策的能力的指标的概括。政府效

能测量一个国家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官僚机构的质量、公务员的能力和独立性,以及政府政策的可信性。这个指标的重点是政府为了生产和执行良好的政策和提供良好的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输入性因素。监管质量测量政府制定并实施的政府市场友好或不友好的程度,如价格管制或金融压抑,以及过度监管给企业带来的负担的程度。第三组指标即法治和控制腐败测量公民和国家对用以治理其互动的制度的遵守程度。“法治”测量代理者(agents)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规则有信心并遵守,包括司法的有效和可预测性,合同的可履约性,犯罪和暴力行为的可能性。控制腐败测量公共权力在多大程度上被行使为谋取私利,包括各种大小形式的腐败行为。腐败往往是腐败者(典型地为私人公民或企业)和被腐败者(典型地为公务员或政治家)对规范其互动的规则的漠视的表现。<sup>[6]</sup>六个指标数据介于-2.5到2.5之间,数值越大意味着治理水平越好。

目前,既有的世界治理指标数据覆盖年份为1996-2009。不少研究者利用这些数据,试图探讨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dams和Mengistu使用发展中国家为样本,以这些国家从1991年到2002年的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因变量,使用世界治理指数、私有化率等变量为自变量建立统计模型。在使用世界治理指数时,考虑到六个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皮尔逊相关系数在0.425到0.898之间),他们使用六个变量的第一因子代表治理变量进入模型。他们的模型显示,世界治理指数的第一因子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通过0.05水平的统计显著性检验。根据这一结果,他们断言,治理确实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甚至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最重要的单一因素。Ndulu and O'Connell<sup>[7]</sup>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样本的研究,Kottaridi<sup>[8]</sup>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的相似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但是,最近Kurtz和Schrack在他们题为《增长与治理:模型、测量和机制》的论文<sup>[9]</sup>中,对世界治理指标所测量的各国治理状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出了与上述研究结果相反的发现。其发现之一是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治理指标的年度数据与该年度之前的各国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是,其发现之二是各国的年度治理指数对于它们在该年度之后的经济发展表现,却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预测力。换言之,“公共制度质量知觉,在很强的程度上被过去的经济表现所预测,但对早先年份的治理测量的数据却对此后的经济成长表现,几乎毫无预测的能力”。因此,他们认为,世界治理指数可能不过是其制作者以及他们所根据的调查的受调查者事后逆向选择的结果,即他们之所以给予一些国家以较高年度治理指数,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年度间有较好的经济增长纪录,而非因为他们确实观察到了这些国家在事实上具备较好的治理状态。他们认为,他们的研究与其说证明了治理决定经济增长,倒不如说证明了相反的假设,“经济发展推动政治现代化”。

Goldsmith通过对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美国、阿根廷、牙买加和毛里求斯的个案分析,同样也证明一国的政治治理水准是高速增长的结果,而非其直接原因。<sup>[10]</sup>作者是通过如下的研究设计及其实施来获得这一结论的。他挑选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出现的增长加速年代予以研究。在这里首先要确定“增长加速”年代的起点。根据Hausmann,Pritchett和Rodrik(2005)的定义,所谓“增长加速”年代起点是从这一时点开始,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显著改进。Goldsmith对这一起点给出了一个工作定义:“增长加速年代指的是一个国家享有3.5%或更高人均GDP年增长率的八年,且其年增长率至少要比此前的八年高两个百分点,而且经过这八年的经济增长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增长加速之前的。”根据这一标准,作者回溯历史,认定在美国这一增长加速的起点年为1877年,在阿根廷为1902年,在毛里求斯为1971年。牙买加由于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作者使用该国独立的1962年作为研究起点。作者从行政管理、司法独立、投票实践、竞选财政和企业治理等五个方面观察治理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1)。在这四个个案中,前三个都在所选时期内发生了经济增长加速。但是在美国和阿根廷,有关治理的改革并没有发生在经济加速增长之前,而是在加速增长发生之后出现的。事实上,在加速增长时代,两个国家都是金钱政治横行。例如,美国就是在所谓城市机器控制地方政治的镀金时代实现经济起飞的。毛里求斯的治理改革大都发生在其经济起飞之前,但问题是它们距离经济加速的时代太远了。例如,它的一项重要治理改革是1953年成立公共服务委员会,但这距经济增长加速起点还有近二十年。毛里求斯的经

济起飞发生在 1968 年独立之后,这个事实比此前的治理制度的改进更为重要。最后,牙买加则是一个有治理改革在先却无经济起飞在后的例证。

表1 增长的关键点和善治

国家	增长加速	收入趋势	改革的标志
美国	1877	起点人均 GDP: \$ 2570 八年增长率,年 3.8% 30 年增长率,年 2.4%	公务员委员会: 1883 - 1940(联邦和州) 司法独立(州层次): 1913(第一个州能力计划) 竞选财政: 1890 年代(第一批州竞选经费披露法案) 公平选举: 1888 - 1910(大多数州秘密投票法案) 投资者权利: 1911 - 1931(州“蓝天”法)
阿根廷	1902	起点人均 GDP: \$ 2717 八年增长率,年 3.6% 30 年增长率,年 1.1%	公务员改革: 1980 年代 司法平等: 1853(形式上的) 竞选财政: 1990 年代(披露法和费用上限) 公共选举: 1912(秘密投票法) 投资者权利: 1990 年代
毛里求斯	1971	起点人均 GDP: \$ 2945 八年增长率,年 7.2% 30 年增长率,年 4.5%	公共服务委员会: 1953 司法独立: 1800 年代 竞选财政: 没有政党披露或费用上限 公平选举: 1947(秘密投票法) 投资者权利: 2004(财务报告委员会成立)
牙买加	无 1962 年独立	起点人均 GDP: \$ 2702 八年增长率,年 2.8% 30 年增长率,年 1.0%	公共服务委员会: 1951 司法独立: 1800 年代 竞选财政: 没有政党披露或费用上限 公平选举: 1944(秘密投票法) 投资者权利: 2001(财务报告委员会成立)

资料来源: Goldsmith 2007: 171。

注: 美元价值按 1990 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从以上四个个案分析中, Goldsmith 得出四个结论: (1) 依据能力决定的官僚体系、独立的司法和诚实的选举确实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它们的齐备未必就会启动经济增长; (2) 在其他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公平公正的公共体制确实有助于生产和收入的增长加速; (3) 善治与其说是高速发展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它的结果,虽然从长期来看,善治对持续发展而言,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4) 当经济发展加速时,腐败也可能加速,尽管这往往会导致反腐败的政治要求和反腐败措施的实施。<sup>[10]</sup>

从以上的文献综述中我们看到,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经济增长和治理改善孰先孰后的问题。用 Kurtz 和 Schrank 的话来说就是“善治真的导致了增长吗? (或者) 经济增长本身带来了更好的治理? 或者,这两个现象都不过是一个更深层但未测量到的省略的变量的独立产物?”<sup>[9]</sup>换言之,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无解的问题。

我们认为,解决善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的一个途径是不去追究究竟谁导致谁的蛋鸡关系问题。具体地说,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治理水平之间有何关系? 我们假设两者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但不假设谁决定谁。这就意味着,我们用以测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最好不用经济增长速度,而用经济发展水平。毫无疑问,今天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迄今为止该国经济增长或不增长中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样地,它的治理水平往往也是中长期积累的结果。我们可以引入一个新的规则,但该规则为社会普遍接受和自觉实行则往往要耗费时日。如诺斯所警告的,制度是长期酝酿的结晶,其变化每每取渐进的方式。<sup>[11]</sup>同时,我们认为,不同的治理要素对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有不同的影响。我们将使用 2008 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治理指标等数据来完成这一研究任务。

## 二

进入我们的定量分析的样本,是除了发达国家以外的 150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数据所反映的是 2008 年的情况。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差甚大。我们的描述性分析表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最

富有者是新加坡,其人均 51680 美元;最贫穷者是民主刚果,其人均 280 美元,平均值为 8514.8 美元,中位数为 4880 美元,标准方差为 8967 元。那么,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它们不同的治理水平加以解释呢?治理的各个因素的解釋力大小是如何分布的呢?我们将使用世界治理指标提供的数据,并佐以若干控制变量,建立简单的最小平方化回归模型,来回答这些问题。

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世界治理指标的六个变量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本文研究的 150 个样本,六个指标的多元皮尔逊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其中,与其他指标相关性最低的是言论与问责,系数值在 0.536 到 0.636 之间,均低于绝对值 0.7 以下,从而符合同时进入回归模型拇指规则。这似乎意味着,言论与问责所测量的治理因素,确实与其他五个指标所测量的因素有相当大的区别。政治稳定变量也仅与法治变量有超过 0.7 水平的相关系数,说明这个变量除了与法治有较高的共线性外,与其他变量之间基本上是互相独立的关系。政府效能与监管质量的相关系数高达 0.903,说明两者反映的现象关系非常密切。此外,这个变量同法治和控制腐败的相关系数也接近 0.9。法治与控制腐败也高度正相关。

表 2 2008 年世界治理指标相关性分析(N = 150)

	言论与问责	政府稳定	政府效能	监管质量	法治	控制腐败
言论与问责	1					
政府稳定	0.536	1				
政府效能	0.636	0.538	1			
监管质量	0.626	0.482	0.903			
法治	0.614	0.726	0.870	0.756	1	
控制腐败	0.632	0.617	0.879	0.774	0.855	1

数据来源:世界治理指标官方网站

注:系数均通过 0.01 水平显著性检验

在下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将首先建立六个模型,每个模型的因变量都是人均 GDP,六个治理指标变量,分别同若干控制变量一道,进入一个模型。通过比较各个治理指标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我们能够断定,在六个治理指标中哪些与经济发展关系更为密切。然后,我们将在不违背共线性检验的情况下,让言论与自由等治理指标变量同时进入同一个模型,以此确定各个治理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小等问题。进入模型的控制变量为内陆国、资源国、开放度和人口。第一个控制变量以内陆国即不与任何海域接壤的国家为 1,其余为零。一般地说,内陆国不利于经济发展。我们预期这个变量与因变量人均 GDP 呈互相关关系。资源国也是一个虚拟变量,以资源国为 1,其他国家或地区为零。一般地说来,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矿石)丰饶的国家更易于发展经济。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资源丰裕的国家往往会遭遇“资源诅咒”,“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聚集集中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矿石和燃料)的国家和地区,反而倾向于具有比资源较少国家和地区更低的经济增长和更差的发展结果”。<sup>①</sup>我们姑且采纳这个学说,假设这个变量与因变量具有负相关关系。国家开放度以一国进出口贸易额占 GDP 比重测量。一般地说,开放度越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我们预期这个变量与因变量为正相关关系。人口变量的引入是为了控制国家或地区的规模。我们不使用投资率、储蓄率、教育水准等变量为控制变量,是考虑到这些变量本身可能就是由各国的治理水平决定的。我们使用的控制变量都是并非或至少并非直接由各国治理水平高低决定的,但又可能对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影响。

以上变量的数据来源分别是:世界治理指标来自于该指标官方网站;人口和开放度来自于世界银行

①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source Curse,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ource\\_curse](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ource_curse)。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内陆国数据来自于维基百科英文版有关网页;①资源国数据来自于 Torvik<sup>[12]</sup> 和 Atkinson<sup>[13]</sup>。

表3报告了六个治理指标分别进入模型的统计结果。模型的F检验值表明它们在统计上是有效的。拟合优度(R平方值)则表明,引入模型的五个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样本差异的43%到61%。控制变量的结果大体如我们预期的一样。开放度在六个模型中均在正的方向上通过了0.01显著性检验,说明一国的经济开放度越大,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资源国变量也在六个模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方向为正,说明资源丰裕国比资源贫乏国更有机会达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内陆国的系数方向均为负值,但仅在模型2通过显著性检验。大体而言,模型表明,在经济发展上,内陆国确实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关心的六个治理变量均在0.01的统计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且方向均为正,说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善治确实与经济发展相连。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我们可以断言,六个治理指标所反映的治理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按自大而小顺序排列是: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控制腐败、法治、政治稳定和言论与问责(表4)。大体而言,言论与问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及政府效能的一半。

表3 治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 2008

(N = 132)

	1	2	3	4	5	6
常量	(0.284)	(1.334)	(3.857)	(3.207)	(2.899)	(3.037)
言论与问责	0.263*** (3.672)					
政府稳定		0.286*** (3.876)				
政府效能			0.569*** (8.938)			
监管质量				0.540*** (8.511)		
法治					0.478*** (7.046)	
控制腐败						0.491*** (7.355)
内陆国	-0.098 (-1.383)	-0.147** (-2.164)	-0.067 (-1.176)	-0.066 (-1.128)	-0.074 (-1.192)	-0.091 (-1.520)
资源国	0.174** (2.447)	0.134* (1.924)	0.104* (1.791)	0.099* (1.678)	0.116* (1.855)	0.137** (2.224)
开放度	0.551*** (7.851)	0.470*** (6.276)	0.319*** (4.949)	0.357*** (3.564)	0.378*** (5.517)	0.373*** (5.522)
人口	-0.013 (-0.184)	-0.008 (-0.111)	-0.074 (-1.296)	-0.041 (-0.711)	-0.044 (-0.718)	-0.025 (-0.407)
R平方	0.427	0.433	0.611	0.597	0.545	0.556
调整后R平方	0.405	0.411	0.596	0.581	0.527	0.538
F	18.949	19.434	39.915	37.560	30.367	31.770

数据来源:世界治理指标官方网站,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注: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0.01、0.05和0.1统计显著性上通过检验。括弧内为T检验值。

① 三个数据库的官方网站链接是: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resources.htm>;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dlocked\\_country](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dlocked_country)。

表 4 不同治理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水平排序

治理指标	标准化回归系数
政府效能	0.569
监管质量	0.540
控制腐败	0.491
法治	0.478
政府稳定	0.286
言论与问责	0.263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和控制腐败合并为一个变量(前述这四个变量的两两相关系数均不低于 0.7、且接近或超过 0.9 的统计发现,决定我们可以这样做),与言论与自由、政治稳定以及四个控制变量同时进入模型,我们得到了一个比表 3 报告的大多数模型解释力更强、而且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的模型(表 5)。在这个模型中,控制变量中仅有开放度通过检验,方向为正,其余的三个控制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水平检验,不过它们的方向与表 3 报告的模型基本一致。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三个治理指标的表现。由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和控制腐败四个指标合成的综合变量是模型中解释力最强的变量,而政治稳定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最重要的是言论与问责在负的方向上、并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些统计发现意味着,在控制了政府效能等治理变量以及各国的自然禀赋(是否为内陆国、资源丰裕国)的情况下,世界治理指标判定言论与问责得分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反而倾向于具有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

表 5 治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治理指标合并模型) 2008 (N = 132)

常量	(4.440)
言论与问责	-0.193** (-2.376)
政府稳定	-0.011 (-0.154)
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和控制腐败合并	0.723*** (7.755)
内陆国	-0.083 (-1.442)
资源国	0.076 (1.288)
开放度	0.276*** (4.134)
人口	-0.068 (-1.183)
R 平方	0.630
调整后 R 平方	0.610
F	30.4761

数据来源:世界治理指标官方网站,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注: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和\*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0.01、0.05 和 0.1 统计显著性上通过检验。括弧内为 T 检验值。

从这些统计发现中,我们能够获得如下两个具有理论和政策意义的结论。第一,尽管世界治理指标数据的形成,不无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但它们确实对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这说明,它们确实是对各国治理制度建设水平的一定程度上的客观反映。这个发现支持了俞可平在《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的序言中提出的如下观点:“我们反对把西方的政治标准当做普遍的政治标准,强调治理评估矛盾、中国立场和中国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治理标准拒绝任何人类的共同价值。按照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政治价值和治理标准也不例外。以为‘中国特色’就是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就不用遵循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就无须分享人类的普遍价值,那是一种无知和愚昧,对国家的发展有害无益。”<sup>[6]</sup>第二,世界治理指标对经

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不同的。其影响力自大而小顺序排列是: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控制腐败、法治、政治稳定和言论与问责。这意味着,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改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控制腐败和法治,同改进政治稳定和言论与问责相比而言,应当具有优先性。而且,言论和问责在表5模型中的负相关统计结果表明,国家政治治理发展摆错了优先顺序,可能导致有害经济发展的结果。

进而言之,世界治理指标中的言论与问责,集中地体现了西方的民主观。让我们回忆一下考夫曼等人对这个指标的定义:它“测量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参与选择他们的政府、表达意见的自由,结社自由,以及传媒的自由”。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而言,这个指标相对于政府效能等指标不具备优先性,这意味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脱离国家能力建设、政府效能提高、政治稳定维护而单兵独进搞政治民主化,可能要付出经济增长迟缓停滞的代价。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较有成效。当然,这需要另外一篇论文专门探讨了。

#### 参考文献:

- [1]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R]. World Bank 2000/2001.
- [2]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R].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3] Kulshreshtha, Praveen. Public sector governance reform: the World Bank's framework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2008 21(5).
- [4] Mauro, Polo. The Persistence of Corruption and Slow Economic growth [C]. IMF Staff Papers 2004.
- [5] World Bank. Governance: The World Bank's Experience [R].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994.
- [6] 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 [7] Ndulu, Benno J. and O'Connell, Stephen A. Governance and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9, 13(3).
- [8] Kottaridi, C. FDI, Growth and the Role of Governance: Chang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J].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2005 24(1).
- [9] Goldsmith, Arthur A. Is Governance Reform a Catalyst for Development? [J].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2007 20(2).
- [9] Kurtz, Marcus J. and Andrew Schrank. Growth and Governance: Models, Measures and Mechanisms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07 69(2).
- [11] 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2] Torvik, Ragnar. Why do some resource-abundant countries succeed while others do not? [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9 25(2).
- [13] Atkinson, Giles. Savings, Growth and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11).

(责任编辑:戴利朝)